

快言快语

完善加班制度
还有不完善之处

杨涛

9月14日，最高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司法解释称，对于劳动者向用人单位追索加班费案件，劳动者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9月15日《新京报》)

新的司法解释为劳动者顺利拿到加班费加上了一些保险。司法解释规定，“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按照最高法院有关负责人的解释，这是考虑到“在类似案件中，一般劳动者举证都比较困难，用人单位一般不会自觉拿出证据，该法条实际上是用法律手段督促用人单位拿出事实证据，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因此，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让劳动者追索加班费变得更容易一些。

但是，司法解释还是为劳动者的举证埋下了隐患。因为，让老板(用人单位)举证的前提是，“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也就是说劳动者还是要先举证说“用人单位掌握了证据”，问题是，许多劳动者根本无从知晓用人单位有无掌握证据，就是知道了，也无法举证说明他们掌握了证据，这样一来，让用人单位举证的愿望就会成为泡影，进而劳动者追索加班费也会成为渺茫。

这种半截子的“举证责任倒置”，或者说半截子的用人单位举证责任，恰恰是司法解释者有意为之，因为用人单位举证的前提是劳动者须有证据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的存在，“这对于个别劳动者刻意刁难用人单位的行为也起到遏制作用。”我不敢确定有个别劳动者会刻意刁难用人单位，但是，以此为理由来让更多的劳动者无法顺利地维护加班的权益，我认为也有商榷之处。

何况，如果用人单位真正完善规章制度并严格遵守制度，就是个别劳动者刻意刁难用人单位，他们也难以得逞。而要形成规范的加班制度，指望老板一方是不太现实的，只有通过司法审判来倒逼老板、用人单位去积极采取规范行动。而这种倒逼方式就是完整的举证责任倒置，也就是说由用人单位承担劳动者没有加班或者已经发放了加班费的举证责任，如果用人单位无法举证，则判定劳动者加了班或者没有领取加班费。相信有了这种举证责任的倒置，没有一个用人单位敢对建立规范的加班制度掉以轻心，因为对制度的疏忽，就是真金白银的流失，这是没有一个用人单位愿意面对的。如此，劳动者再也不用操心加班费的问题，他们只要安心加班，在得不到应有报酬时向法院起诉就是。

头条评论

舒圣祥

陕西吴起县，距离延安170公里，人口约13万。就在前不久，它宣布实行免费教育的消息让吴起受到“大”瞩目。也就是说，在吴起县，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全部免费是人人享有的“福利”，对未升入高中和大学毕业未就业的，年龄45岁以下农村劳动人口都可以接受免费技能培训。(9月15日《人民日报》)

先是陕西神木县的全民免费医疗，后是陕西吴起县的全民免费教育，还有东莞石排镇的25年免费教育，这些因煤因油因改革而富起来的地方，纷纷将关注的视角转移到民生福利的增长，展示出一种明显有别于传统GDP崇拜的新型政绩观。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地方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改变，皆与主事官员的个人执政理念关系密切。

事实证明，经济发展与造福民生，其实是双向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经济的发展让民生的改善拥有更好的条件基础，这也就是为何令人艳羡的民生福利大多出现在经济相对发达地方的原因；另一方面，改善民生解除了公众的后顾之忧，又必然会在对应的层面极大促进经济发展，那些花大力气改善民生的地方，事实上无不怀揣一个更长远更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以，当国内经济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为什么一味追求GDP增长，而不顾民生艰辛”确实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追问。

比较遗憾，当下的很多地方的政府官员头脑中的政绩观，依然完全是以GDP崇拜为核心的，甚至GDP崇拜就是全部的内容，为此不惜枉顾一切，无论是民生艰辛还是环境破坏，然而，这其实又很正常，因为当下的官员考核机制就是在这样引导和评价着官员群体。这样去想，为何那么多更为富裕的地方没有在改善民生上做出应有的表现，也就不难理解了。既然一切皆与主事官员个人因素关系甚大，那么当然不能奢望“神木模式”马上就变成“神州模式”。

然而，我们还是很欣喜地看到，毕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政绩观开始主动从GDP崇拜往民生崇拜的方向上转变，这是制度引导下的潮流政绩观与民意呼唤下的新型政绩观之间进行的一种碰撞。不仅普通民众在评价在褒贬，各地方的官员其实也在观察在选择。有理由相信，只要这种民生崇拜的新型政绩观，不仅能够取得民众的支持和肯定，也能在实际施行中取得良好的客观效果，其对官员政绩观转变的推动作用，较之于类似“民生幸福重于GDP数字”的单纯说教，必然要有效得多。

善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勇敢地走出了第一步，别人可以从他们的真实经历中得到观察与反思的机会；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少数地方先行做出试验也好，率先树立榜样也罢，重要的是他们那样做起来了，在不同的维度上因此有了不可回避与无视的参照。作为公众，我们没有能力直接转变官员政绩观，却也不该放弃间接施加影响的努力，在该要赞美的时候绝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不仅为了肯定先行者更为了激励后进者。

群安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曾表示，卫生部收到国家粮食局提交的有关“停用面粉处理剂——过氧化苯甲酰”的申请材料，将提请全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化委员会按照有关规则进行讨论，再最后作出是否禁用的决定。显而易见，时至今日仍未讨论出结果。

关于面粉增白剂的论战中，国家粮食局以及很多国内大型面粉加工企业，是坚定的“主禁派”，食品添加剂企业以及食品添加剂标准化委员会则是“反禁派”。“主禁派”的理由是，增白剂不仅会破坏面粉的营养结构，而且因具有致癌作用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反禁派”的理由相对简单，不过是针锋相对地提出，增白剂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孰是孰非，有关部门最终总要给公众一个交代。

“反禁派”提出美国并没有禁用增白剂。这或许是事实，但是姑且不谈中西方不同的饮食结构，美国的不禁止也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良好生产规范》，如果没有按具体的管理规定生产，就会被美国法院裁定是违法行为，付出高昂的法律代价。反观国内，连是否添加了东西消费者都无从得知，又怎么会知道添加了什么、添加了多少以及是否还会添加别的什么东西？到底又有多少无良企业因此而承担了法律责任？此中的混乱，岂是消费者所应独立承担的？

《食品安全法》已于去年6月1日起实施，其中对添加剂的规范从无善转变到了必要，即以前是有害就可以添加，现在是有必要才能添加。撇开增白剂是否有害这样的内容，卫生部此番有必要论证增白剂是否面粉所必需，有必要得出一个结论，本着对民众安全健康负责的态度，也为了体现出法律应有的权威与尊严。以平息面粉增白剂论战为目的，不失为规范食品添加剂的一次契机。无论什么时候，消费者都有权知道他们到底吃了些什么。

上课。

有人说在国外，大街上到处是穿比基尼的美女，教师穿个吊带衫算什么。这种思维貌似理直气壮，其实是偷换概念。我不知道国外是不是真的满大街都是“三点式”，但民风民俗植根于文化和传统，国外女子穿三点式上街可能习以为常，可不意味着中国妇女也能做到。如果教师在休息时间穿吊带衫上街，没有人会反对，但穿着暴露进课堂，就违反了职业文明，给学生以不好的影响。

适度克制私利和欲望，确保职业文明和秩序——避免穿着暴露，本就是教师可信仰、应坚持的操守，而为什么一定要穿“吊带衫”进入校园和课堂？军人穿军装，警察有警服，医生护士还要穿白大褂，企业职员要穿工作服……教师在穿着上端庄一些，实在不是很苛刻的要求。

从GDP崇拜到民生崇拜的可贵转变

避免穿着暴露是教师应坚持的操守

认为，这只是一份“建议”，并非强制的制度。可以视为是管理伦理的某种进化，而不是所谓的“教师权利限制”。“约束”是表象、是方法，而关爱和警示才是“内涵”，从长远来看，获益的是校园文明和师德。实在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到“自由和权利”的高度，进行喋喋不休地争论。

笔者从头至尾仔细看完了“礼仪建议”的全文，觉得除了个别“条款”尚有待商榷外，整体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建议教师穿着得体大方，不代表不允许教师穿流行时装；建议教师不浓妆艳抹，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不允许教师化妆。这完全是两个概念，不可以混淆而论。而事实上，教师作为为人师表的特殊职业人士，其衣着及行为礼仪“符合教师身份”难道还有什么不妥吗？

文明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心态和养成，文明的存在天然附着有相应的管制和约束。“教师不许穿吊带衫”侵犯了自由——这种逻辑其实很滑稽。没有绝对的自由，没有人生活在真空中，上有法律高悬，下有规章制度约束，意识形态领域还有道德底线和文明规范，我们的言行举止时时刻刻都需遵章守纪把握分寸。如果“自由”可以信马由缰、率性而为，不要说教师穿“吊带衫”，就算是为教师裸奔也不足为奇，可问题是我们恐怕接受不了教师光着屁股给学生

校园“育人”
应补生命教育课

朱书缘

九月以来，接连发生的几起大学生意外死亡事件广受社会各界关注：9月8日，武汉一所高校的女生在军训现场突然倒下，最终被诊断为脑死亡；9月9日，湖北经济学院一名新生在军训第一天不幸猝死；就在前不久，北京某高校一名大三学生在打篮球时突发心脏病致脑死亡。

这些遭遇不幸的大学生中，有的学生平时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格外重视，有的是因为身患先天性疾病，并不适宜剧烈运动或参与高强度的军训项目。遗憾的是，在事发前并没有相关人员告知他们，悲剧已经发生，校方再多的努力都是事后补救，真正要从更大程度上减少甚至杜绝这类不幸事件的发生，就必须重视与防范先行，因此，笔者认为，校园里的生命教育课不可或缺。

在国外，生命教育很早就被列为学校日常教育的重要环节。而在我国，生命教育的执行情况并不容乐观。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都是学生会等自发组织进行一些生命安全教育活动，不仅不可能让每一个学生都接受教育，更难以形成机制和深入开展。

学校作为育人的地方，教会学生珍爱生命是提升国民素质的题中要义。笔者认为，在学校的日常运作当中，最直接的办法是单独开设生命安全教育课，并且作为学生的必修课，这样能够惠及所有学生，真正提升学生对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这样的生命教育的事前预防与事后补救相比，无论在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上，都应该是划算而且值得的。

从扶贫到建立保障制度

潘启雯

蔚然给出的建设性意见是，首先从用于农业生产的金融体系入手解决；其次，不妨借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例如，美国加州的杏仁协会对协会成员的资金帮助，就是通过协会内部金融运行的方式合理支持成员解决生产所需的资金问题。

作者在考察中也体察了中国农民的“朴素”。农民们在贫困中毫无怨言，贫穷、没有退休的权利、创业无门……都不能破坏他们对生活的信心。他们不仅是“良民”，而且是真正的“粮民”——不仅“民以食为天”，而且为城市持续提供着食粮。

当然，作者观察和了解到的中国农村问题和现象还远远不止这些。在逃离了饥饿与物质短缺的折磨之后，当下的农村又陷入了与历史总总的生态危机之中。

为什么城市户口者生来占有众多资源，而农村户口者则需要艰难挣扎？如果仔細地分析，其本质就是一个不公平的问题。深入思索这件事，很容易令人愤怒，但是，正确的态度，应是本书作者所持定的这种：既然后问题已积淀了那么久，那么多，就只剩下正视与解决这一条道路可走了。作者也借许多有良知的专家学者之口，道出了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方法，其中最基本的一条，便是打破城乡界限，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即“不要扶贫，要公平”。

“中国农村会消失吗？”——这本书的副标题本身就是个世纪的叩问。蔚然体验式的精神还乡，不过是暂时离开水泥地面到乡村里交接地气，从农村的土地上获得一些力量。我们每个人现在所能做的，便是有所警醒，感受到这种弥漫于四周的问题，并且积极努力地使其改变。

《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上下册]，爱新觉罗·蔚然/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

新书浏览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

作者：任学亮 编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中日战争已经过去近七十年了。这场牵动两大民族恩怨是非的历史事件，至今在心理上也依然波涌不息。后人可能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理解历史。

本书是“密档中的历史”之一，特按专题选辑若干制成简编本，以臻读者。专题的则是，在内容相同或相近的篇目中，选择信息最完整、线索最清晰、细节最丰富、史料最翔实者，汇成一帙，力求完整呈现专题所涉及事件的全貌。

从扶贫到建立保障制度

潘启雯

如果我們长久以来的努力，是为了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有安全感，也许我们的目的已经或正在达成。当然，如果是在农村，这里的“我们”，其实只是代表着那些享受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新农村建设”等政策带来的各种果实的人们。而更大范围的“我们”，生活是否都已好了许多呢？这个问题着实令人疑惑。

研究“三农”问题的青年学者爱新觉罗·蔚然，在《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中，试图通过百万字的考察日记和近万张记录照片给出答案。只是他没有给出结论。中国农村问题太过复杂，复杂到令绝大多数身处问题之中的人，甚至都忘记了思考。也许，这正是本书最大的意义所在：没能告诉答案，却促使我们去找寻。

蔚然于2004年在上海创立了民间公益社团——幸福发展促进会，由此开始“专职”帮助农民脱贫、解困、发展，同时也致力于农村、农民问题研究——于2006年启动帮扶“万村行”工程，立志用25年走遍全国贫困农村，帮助贫困家庭走上健康、良好的发展之路。本书正是他在2006年至2009年期间，在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深入农村考察的成果。

相比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蔚然再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乡村。蔚然所记录的真实中国农村的状况，用“个人史”的方式描述出社会的一个断面，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对中国问题增加几分必要的焦虑感和紧迫感。

以农村小额贷款为例，银行借钱给农民解农业生产之急，本是一件好事，然而，作者在深入考察中发现，某些地方“贷款”的独特走向及其局限性，使得农民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为难道地。

黎家故事

穿越黎族风情的时光隧道

梁昆

新近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由吉明江明、符天明主编的《黎家故事》(昌江篇)，作为一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礼的图书与读者见面了，它以黎锦图案封面作背景，鲜亮的设计吸引了读者的目光，它就像一位身着黎服的黎家小姑娘，轻快地奔向阳光海南的度假天堂。

昌江是中国海南岛西部的亮点，是生长黎家故事的地方。这里独特的黎族民俗风情，孕育了远古昌江的奇特传说。这里有亚洲第一富铁矿，也是海南的水泥之都；既有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也有世界仅存的海南黑冠长臂猿。《黎家故事》以俚(悠久历史)、丽(美好家园)、黎(民族自治)、礼(文化渊源)、励(志在登攀)四个篇章次第展开，书中还有远古昌江袅袅的足音，有黎婚嫁节庆的独特民俗，有生长黎家故事的旖旎山水风光，也有黎族制陶、黎锦、船形屋等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厚重的身影。它以图文并茂的纪实文学形式，反映了黎族社会的民俗风情，反映了新中国成立61年来昌江黎族人民生活的真实风貌。

《黎家故事》还是一部彰显新昌江精神风貌的书，是一部记录新昌江科学发展历程的书，它讲述着自治政策的人文关怀，记载着各民族团结进取的足迹，吟咏着黎胞建设新生活的诗章。

该书的编写出版，经由昌江黎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批准，由县民族宗教委员会组织海南省作协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共同完成，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穿越时空、多角度、多侧面了解昌江黎族传统文化的窗口，让更多的读者不仅了解昌江黎族文化的本源，也兴致盎然地品味图文背后鲜活的黎家故事。海南省民族学会会长王学萍在本书序言中提及：“本书的出版，对于增强昌江黎族人民的自尊感和自信心，帮助外界认识和了解昌江，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翻开《黎家故事》，犹如穿越凝聚了千百年黎族风情的时光隧道，跋涉在古色古香、原汁原味的黎家生活的丛林之中。

黎家故事

穿越黎族风情的时光隧道

梁昆

《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根据国学大师季羡林生前10个月时间共计75次的口述录音整理而成。为众多季羡林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珍贵的资料。诸多围绕在季羡林身上的谜团也逐一解开。

和谐这个概念很了不起

季羡林：谢谢你光临。

吴志友：我们作为国学季羡林普通管理者，来听听国学大师的教诲。孔庙国子监要还其旧制。今年(2008)6月份就叫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了。这个馆怎么办，请您讲讲意见。

季羡林：不敢当。你请讲吧。

吴志友：现在就叫博物馆了。国子监过去是大学，现在挂牌，是孔庙国子监博物馆，你们想讨教先生。

季羡林：我没有去看过，你们有图有样吗？

吴志友：有个资料室。季羡林：还应该大一点。这个书籍最重要，与这个有关的，韩愈的《劝学解》说：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就是韩愈的，国子监(祭酒)，就是等于现在的大学校长。因为这个中国的最高学府啊，从东汉开始，名称有几次变化，有的叫太学，有的叫国子监。这个韩愈就是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太学与国子监，搞在一起的。一般讲是两个，有时候叫国子监，有时候叫太学。每个朝代的最高学府就是国子监。每个朝代都是这样子，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别的国家啊，没有这么重视文化研究的。中国那是历代都是这样。我就说，这个一定要搞一个大的图书馆。有人愿意捐助，可以捐助图书，有人专门从香港购买图书到大陆来，香港的石景山，有一次，他在深圳，邀请了80个大学、高等学校的校长，每个学校都分到一些他捐的书，他捐的书，有特点，主要是给海外的、台湾的，我们买起来，不容易得到的。他专门捐助这些书。蔡德贵：他们原来有个图书馆，现在归文化局管了。想建孔子书院，然后建图书馆。

季羡林：就是啊。孔子学院现在已经不少啦。

吴志友：我们不是专门经营图书。主要搞讲座，讲中国文化，讲孔子。

纪捷晶：孔子书院，想请您当院长。

季羡林：不敢当。

孔子是大成至先师，可是这个解放以后啊，也经过一段艰苦的历程，不是解放，就是“五四”运动以后啊，打倒孔家店么。“五四”运动，那个运动当然很重要了，但是有些做法有点极左，有的过了头。孔家店是不能打倒的，应该大大地开张。孔子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是礼、乐、射、御、书、数，德育、智育、体育全部包括，全面发展。

纪捷晶：请您先看照片，是我们举办的活动，包括拜师礼。

季羡林：我眼睛看不见。

吴志友：博物馆展览介绍孔子的思想。国子监介绍科举制度的展览，科举制1300年，通过展览，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想听听您对传统文化的见解。

季羡林：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根本的区别，西方文化就是讲斗、斗、斗，中国的是和为贵，建立和谐社会。孔子是这样子，“五四”运动啊，在中国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个运动。“五四”运动当时有些做法过了头，打倒孔家店，是当时提出来的口号，这些事情都难免。后来“批林批孔”，我们特别有一阵子，极左相当的严重。

吴志友：现在形成国学热。蔡德贵：这个与先生有关。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大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您是被排在第一位的，《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您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

季羡林：我说国学啊，就是中国文化，这是可以画等号的。天人合一，就是这个天人眼，不要斗争，人与大自然要和谐，不要斗争。这个西方跟东方有很大的区别，西方是《天演论》那一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西方首先要提出竞争，要斗争，然后适者生存。时代变了，我们不能讲斗、斗、斗，我们要讲和、和、和。我说，什么思想都要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变的，变的根据，就是人类要向更高的层次发展。